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44) 第 00000 号

国际广播版图书摇版权所有摇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前 言	(员)
第一章 历史变迁	(员)
第一节 中国为中心的模式	(圆)
第二节 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	(员圆)
第三节 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	(圆圆)
第四节 冷战结束和中国周边安全 环境的变化	(源圆)
小结	(源圆)
第二章 层次分析	(源圆)
第一节 综合安全的概念	(缘圆)
第二节 政治安全	(缘圆)
第三节 军事安全	(远圆)
第四节 经济安全	(苑圆)
小结	(愿圆)
第三章 地区分析	(愿圆)
第一节 东北亚	(愿圆)
第二节 东南亚	(员员圆)



第三节 东南亚	(100)
第四节 中亚	(101)
小结	(101)
第四章 台湾问题	(102)
第一节 政治分离主义	(102)
第二节 台海危机	(102)
第三节 相互依存	(102)
第四节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危险	(102)
小结	(102)
第五章 大国因素	(102)
第一节 美国	(102)
第二节 俄罗斯	(102)
第三节 日本	(102)
第四节 大国关系	(102)
小结	(102)
第六章 多边主义	(102)
第一节 多边主义概念及意义	(102)
第二节 亚太多边主义的发展	(102)
第三节 亚太多边主义的发展与中国 的周边环境	(102)
小结	(102)
第七章 政策选择	(102)
第一节 周边政策的目标	(102)
第二节 周边政策的思想与实践	(102)



第三节 摇新问题 摇新思路	(圆愿)
小摇结	(猿园)
结摇论	(猿苑)



修改和补充工作，现在奉献给读者是第三稿。在撰写和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获得很多乐趣，也遇到不少困难，并且多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动的话，我这些年来可能就难以有足够的信心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以及书稿的撰写。我也因此对基金会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的写作也得益于我所参加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对一些周边国家的访问。~~员恕愿年~~~~员至~~~~源月~~，我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运~~~~模~~~~集~~~~云~~~~探~~~~性~~~~研~~~~究~~）的资助和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崔相龙教授（后任韩国驻日本大使）的邀请之下，在韩国高丽大学从事“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课题的研究。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的高潮阶段，这段生活经历让我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此后，我又于~~员恕愿年~~和~~员恕愿年~~两次赴汉城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的学者一起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使我获得更多有关朝鲜半岛的知识。~~员恕愿年~~至~~员恕愿年~~年间，我两次赴日本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对越南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进行过走马观花式的访问，有助于我获得一些有关这三个中国邻国的感性认识。此外，~~员恕愿年~~至~~员恕愿年~~年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以及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担任为期一个月的客座研究员，也使得我有机会阅读更多的有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文献、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与



国外的同行（包括来自中国周边国家的同行）探讨有关的问题。当然，在国内参加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学术研讨会同样也让我受益匪浅。上述这些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我加深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认识。

这本书还是我的一个教学成果。从 ~~1992~~ 1992 年到现在，我先后四次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这门课。备课的压力，迫使我不得不多次对书稿加以修改和补充。在课堂上与学生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不少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些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中国的周边国家。他们让我获得了不少有关中国周边国家的知识。和同学们的交流，对我修改书稿的帮助的确是很大的。我也从中更深刻地领会了“教学相长”的含义，并且以作为一名教师而感到自豪。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学生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本书的焦点是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但是，为了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本书也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历史变迁。在阐述完历史变迁之后，本书分别从层次分析、地区分析、台湾问题、大国因素以及多边主义等五个方面，试图对冷战后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多维的透视。最后一章是探讨中国周边政策选择问题，表述作



者的一些看法。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一定很合理，也肯定不可能包含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各个方面。它只是反映了本书作者个人的分析视角而已。

作者在这里有必要就“中国周边地区”这个概念做些说明。我所说的中国周边地区，不仅仅限于中国的邻国，即那些与中国有共同的陆上和海上边界的国家，它还包括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并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如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东南亚和中亚的其他国家）。另外，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中国周边地区的范畴，而且香港、澳门已经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回归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但是，这几个地区的地位很特殊，它们早已在经济上同中国的很多周边国家融为一体，台湾问题更是影响周边安全环境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在书中把它们也视为特别的“周边行为体”加以考察，并重点分析台湾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最后，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本书也把美国视为一个特殊的“周边行为体”或者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国家来加以考察。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前景不确定和难以把握的研究题目，可参考的材料也不算太多，有关资料的分布极其零散，而且个人的研究能力也很有限。所以在写作和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总是深深地感到知识贫乏、力不从心。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从事



这项研究工作，也真诚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这些年来，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李方，所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一直是我从事这项课题研究的一个动力。我的父亲张河圻、母亲冯佩蓉是一对在闽北山区从事小学教育事业数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他们教会了我做人、为师的基本道理。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张小明

2004年11月于北大燕东园



第一章 历史变迁

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很特殊,它是欧亚大陆东部的一个大国,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同自己相邻的国家,而且自近代以来,其中有不少邻国是大国。这样一来,处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始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同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是历代中国统治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推动这种变迁的动力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包括王朝的兴衰和政治变革。其二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互动关系的变化。其三是发端于近代西方的国际体系向东亚地区的扩张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所以,同中华文明史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事实相适应的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是我们分析今天以及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前提。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历史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本书的论述自然无法面面俱到。本章拟从宏观分析的角度,粗线条地勾画出这一历史变迁过程的基本面貌。作者认为,在冷战结束以前,中国同周边地区的关系出现过三种格局或者模式,它们是古代时期的中国为中心的模式或者“华夷秩序”,近代时期西方



列强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或者“冷战模式”。冷战结束后,中国同其周边地区的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新模式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目前给它取一个名字似乎还为时过早。

第一节 摇中国为中心的模式

从考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笔者把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研究的历史起点。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同外界交往为内涵的对外关系史,如何处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开始成为中国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从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作为“中央王国”,基本上都是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实际上在发端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以前,在世界上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多种所谓的“地区体系”或者“区域体系”。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区域体系”。^① 对于这一体系,学者们通常称之为“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朝贡关系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样一个地区体系或者区域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把中华帝国和它的朝贡国之间的关系称为“宗主国—国家体系”,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②

① 王正毅著:《边缘地带发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王正毅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见 王正毅著:《边缘地带发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王正毅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 页。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蔑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处于中心地位,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而周边国家相互之间一般不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同周边国家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形成了中心—边缘关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同其邻近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垂直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华夷秩序”或“华夷体系”、朝贡体系。^①也有学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制”。^②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疆界在不断发生变迁,其基本趋势是范围越来越广大。同时,中国周边地区的属国和朝贡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疆界,西接中亚,东至库页岛,北达漠北,南至南海团沙群岛。包括内地 **员** 省,东北地区,内蒙古 **缘部 缘旗**,外蒙古 **源部 源旗**,乌梁海地区,青海蒙古 **源旗**,西藏,新疆地区。周边国家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苏禄、老挝、廓尔喀、巴达克山、爱乌罕(阿富汗)、浩罕王国等为中国的属国或朝贡国。^③它们同清王朝保持着藩属—宗主关系。

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

① 华夷秩序形成于何时?学者们看法不一致。日本学者信夫清一郎在《日本外交史》中认为,华夷秩序存在的时间,只限于明代(**员**~**员**年)。中国学者何芳川教授认为,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渐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时,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员**年第**员**期,第**员**~**员**页。

② 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员**年版。

③ 崔丕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员**年版,第**员**~**员**页。



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霸权理论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相当于地区“霸权体系”(霸权体系),而中国则类似于“霸权国”(霸权国),它在这个系统中占据“统治或者主导地位”。^①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周围国家同它保持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②实际上,其周边邻国唯一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王朝皇帝称臣纳贡。如清朝曾规定,朝鲜每年、琉球每隔 1 年、安南每 2 年、暹罗每 3 年、苏禄每 4 年、老挝和缅甸每 5 年朝贡一次。^③但实际朝贡次数和规定的朝贡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琉球在 1609 年至 1653 年 5 年间为 5 次,1653 年至 1683 年 3 年间为 3 次,也就是一进入 17 世纪就成了 3 年进贡 1 次这样一种比例。还有,暹罗在 1609 年至 1683 年 5 年间为 5 次,而 1683 年至 1703 年 2 年间则为 2 次,即平均 3 年一次……再说缅甸,到 1683 年为止,不过 2 次,而 1683 年至 1703 年 2 年间则为 2 次,即平均 3 年一次……”^④在特定情况下,朝贡国也可以延期朝贡或者“补贡”。^⑤

但是,当时的中国同近代西方霸权国家有所不同,中国对其藩属国没有实施直接的统治,较少使用强制性力量(如军事威胁)。朝贡制度是“夷狄”表示承认中原王朝优越性的方式,中国对邻国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不是直接控制(包括军事占领)。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而且朝贡国往往很

① 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142 页。

②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③ 崔丕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第 100 页。

④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 1954 年版,第 103~104 页。

⑤ 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0 页。



看重朝贡的通商价值,以此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因为朝贡使带来的本国产品可以在贡路上和中国国都特设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回赐”,其价值通常高于朝贡使奉献的贡品,即“厚往薄来”。^①中国朝廷并不重视通商的利益,而把对朝贡国的回赐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朝贡制度的意义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家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②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王朝衰落、自顾不暇时,原先的朝贡国往往摆脱中国的影响,甚至向中国挑战。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朝贡体系中,当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国力强盛的时候,周边安全环境则稳定,反之,周边安全环境则不稳定。

虽然中国主要是靠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或者“观念力量”维持朝贡体系的,但是这种影響力的背后无疑有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物质力量”的后盾,而且中国王朝在扩展、维持这个朝贡体系的过程中也有时使用军事力量。这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表现得尤其明显。如隋唐都对高句丽进行远征,以使之成为自己的藩属,但没有成功,几次远征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是唐联合新罗,击溃了高句丽和百济,新罗统一朝鲜并向唐臣服。明朝曾出兵朝鲜半岛,击退日本的入侵,维持该地区为中国藩

① 戴逸著:《~~历史~~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91~~页;我看到有的韩国学者在文章中也承认,中国同其藩属国之间的贸易常常以朝贡和赏赐的形式进行,虽然是朝贡,其实对受赐方十分有利。见:具千书:《参鸡汤—滋补的源泉》,《高丽亚那》, ~~1994~~年夏季号,第 ~~128-129~~页。

②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98~~页。



属国的地位。元顺帝到元惠宗年间,元朝对缅甸发动战争,以元军攻下蒲甘而告终,元惠宗元年元朝再次派军队入缅进行征讨,确保缅甸对元臣服。清朝乾隆帝时,越南南方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西山农民起义,国王被迫外逃并且求援于清朝,清军进军安南,西山军击败清军后接受招安,清朝封受降的起义军首领为安南王。直到法国入侵之前,安南一直保持同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乾隆时,清军也曾出兵缅甸,以维护边境安宁和保证缅甸对中国的藩属地位。

在华夷秩序下,来自周边地区安全挑战,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华文明发端于大河冲积平原地带,黄河和长江流域广阔的农耕地区是历代中国王朝的心脏地带。其北部邻近地区是草原、大漠,为游牧民族栖息之地。草原和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这种地缘特征,使得中原帝国极易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的影响。^①实际上,在华夷秩序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外来威胁源,维护北方周边安全环境始终是中国统治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王朝强大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能够被遏制,而在王朝衰落的时期,它们则自北向南长驱直入,蹂躏中原,甚至颠覆王朝。当然,入侵者往往被汉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十分强大的游牧民族,不断掠扰中原地区。公元1世纪,几个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氐和羌入侵中原,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史称“五胡乱华”。其中一个“胡人”的部族,即鲜卑的拓拔部,甚至建立了一个较长久的王国——北魏,并统一了中国的北方。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是西北方的主要“夷狄”。衰落的唐朝,再次将“夷狄”士兵引入其腹地,充塞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宋代的时候,契丹族建立的辽国、羌族党

^①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第153页。



项部落建立的西夏国以及女真通古斯族建立的金国,给北宋和南宋政权以极大的威胁,宋朝曾向这些“夷狄”割地赔款,甚至称臣纳贡。12世纪兴起的蒙古部落征服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欧亚帝国,元朝的统治长达一个世纪。明朝时期,防范北方蒙古人的势力,花费了统治者的很多精力。例如,14世纪70~80年代,蒙古人瓦剌部的新酋长征服了哈密,然后将其影响扩大到东部直至朝鲜的各个部落,15世纪下半叶他抛弃了向明朝进贡的形式,动员了手下沿边境的骑兵出兵逼近大同。蒙古人的军队俘虏了带兵到大同作战的明朝皇帝,并且进军到北京城下。由于北京城防守严密,朝廷也拥立了一位新皇帝,瓦剌部在相持几天之后退兵回蒙古,第二年送回了被俘的明皇帝,然后重新向明朝进贡。15世纪,蒙古东部的俺答汗联合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从东北进入长城,在北京附近劫掠了好几天才撤走。俺答汗在大同西北的归化(呼和浩特)建立了都城。一直到清帝国兴起时为止,蒙古人不断骚扰着中国北部边境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便是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清朝通过征服内外蒙古和确立对西藏的控制,维护了北部和西部边疆的安全。但是,俄国人的入侵和蒙古、新疆地区的叛乱,是清朝长期面临的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总之,在中国的各个朝代,北方“夷狄”的入侵一直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最主要因素。^①

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之外,也有来自其他方向的挑战。日本是东部对中国安全构成挑战的一个重要威胁源。日本是一个海上国家,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曾经在很短的时期内作为朝贡国加入过华夷秩序,但是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10世纪,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王进贡,并接受了魏王授予的“亲魏倭王”称号和金印。后来

① 戴逸著:《15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5页。



足利幕府(1393~1573年)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出于掌握外交权和贸易权的需要,曾于1401年向明王朝朝贡,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还得到进行贸易用的“符信勘合”。1409年,足利幕府第九代将军足利义尚又为得到“十万贯”铜钱而派遣了朝贡使。^① 中国王朝曾经努力以武力征服日本,如元朝军队曾远征日本,但无功而回。日本在14世纪建立统一的国家之后,断绝了同中国王朝的藩属关系,此后日本是在东亚朝贡体系下,少有的未成为中国臣属国的中国周边邻国之一。不仅如此,统一后的日本还试图向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发动挑战。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占领中国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并且借道朝鲜侵略中国。1392年开始,日本两次进攻朝鲜,明朝军队曾应朝鲜的请求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军队击退了日本的入侵,日军在1419年最后撤出朝鲜半岛。中国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据美国学者估计,明代用于对付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的开支总数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后来对付第二次入侵也花了大致这么多费用。日本入侵朝鲜是日本对北京日益减少的财库的最后一次耗竭,为1449年以后中国内部的盗匪和外部“夷狄”入侵者的兴起铺平了道路。^② 明朝时中国沿海地区也深受倭寇之害。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劫掠物品,甚至在舟山群岛建立基地。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过其他周边国家的挑战。比如中国受到过来自南方的交趾等国的入侵。宋代的时候,南方的交趾独立,并多次侵犯中国边境,宋军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反击。元十四年(公元1273年),缅甸蒲甘王朝的军队对云南发动武装进攻,被元军击退。

中国对付这种外来威胁的手段是多方面的。第一,发动征战和扩张,这是王朝在强盛的时候通常采取的办法,主要是进攻性

① 崔丕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38页。

②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第149页。